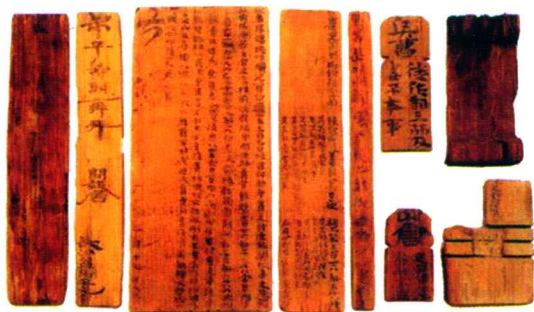


中国三国历史文化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李凭 梁满仓 叶植◎主编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三国历史文化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李凭 梁满仓 叶植◎主编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三国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李凭,梁满仓,叶植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8

ISBN 978 - 7 - 216 - 07308 - 0

I. 中…

II. ①李…②梁…③叶…

III. 文化史—中国—三国时代—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236.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3185 号

中国三国历史文化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李 凭 梁满仓 叶 植 主编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印张:18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插页:3

版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2 千字

定价:58.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7308 - 0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湖北文理学院(原襄樊学院),坐落沔水之畔,背倚隆中胜景,地属名城襄阳,形势得天独厚。三国之际,襄阳地处冲要,人文荟萃。诸葛亮躬耕陇亩,助刘备以成就霸业;关云长水淹七军,降于禁而威震华夏。众多人物发迹于兹,诸多事件牵动政局。正因为如此,三国历史文化成为湖北文理学院的重点研究对象;也因为如此,湖北文理学院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缔结了深厚的夙缘。

20世纪70年代以降,由于历史的契机,一批著名历史学家来到湖北文理学院执教。黄惠贤先生在此授业多年,余鹏飞先生更是扎根襄樊。老一辈学者辛勤耕耘,为襄阳现代三国历史文化学的创建著了先鞭,为湖北文理学院的学术发展奠定下坚实基础,从而在国内外知识界建立起声誉,扩大了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5年9月1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与襄阳市政府和学界合作,邀集海内外一百三十余位学者,召开第五届学会年会,在圣地隆中议论风发,研讨三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通过第五届年会,密切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与湖北文理学院的学术合作关系,促进了本地专家与外地学者的交流,推动了三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与教学。

数十年来,湖北文理学院的三国历史文化学蓬勃开展,成就卓著。黄惠贤、余鹏飞教授主编的“三国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等出色的学术成果陆续发表,叶植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脱颖而出。在此基础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与襄阳政府、湖北文理学院再度合作,于2010年9月26日在湖北文理学院召开“中国三国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二十七位来自海内外

的专家出席会议,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前辈史家,又不乏思绪敏捷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富于创见而语出惊人,论证严谨而见解深刻,就三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人物、宗教、文化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发表了诸多真知灼见。

“中国三国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已近两年,然而学界对它记忆犹新。为了留住记忆,也为了弘扬学术,征得各位专家的同意,由湖北文理学院出资,现将此次会议论文编辑出版。相信本论文集的出版,必将更加密切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与湖北文理学院的学术合作关系,必将更加促进湖北文理学院与海内外学界的交流,必将更有力地推动三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与教学。

值本论文集付梓之际,感谢湖北文理学院叶植教授和他领导的襄阳及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的同仁,他们为编辑出版事务付出了辛勤劳动。

李 凭

壬辰(龙年)仲夏

前言

2010年9月26日,在襄樊成功申报成为“中国三国文化之乡”并建立“中国三国文化研究基地”之际,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与襄樊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襄樊学院(2012年2月改名为湖北文理学院)承办的“中国三国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襄樊学院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李凭先生,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会长兼秘书长梁满仓先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和香港特区、日本的中外著名专家学者27人,是襄樊市(2010年12月更名为襄阳市)三国历史文化研究历程中的一次盛会。各位专家就三国历史中的政治、军事、经济、人物、宗教、吴简及三国文化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专家们的见解严谨而富有创见,某些方面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对推动中国三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必将大有裨益。为全面反映此次研讨会的成果,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和湖北文理学院组织出版《中国三国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论文集收录的23篇文章,绝大部分是与会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收录过程中,得到了这些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在论文集编纂过程中,湖北文理学院副校长王为一教授给予了大力支持,靳进老师做了主要的编辑、校对工作,张欣和李梦泽两位博士校对了部分文稿,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由于会议筹备较为仓促,准备工作不充分,加之学术能力的限制,收录、编辑不周之处甚多,尚祈与会专家学者及学界同仁谅解。

2012年6月10日

目 录

近年来三国历史研究状况	梁满仓〔 1 〕
对诸葛亮“南征北伐”的评价	朱绍侯〔 9 〕
对习凿齿卒年及其著作的检讨和蠡测	黄惠贤〔 18 〕
善“解大数”的东吴政治家鲁肃	王鑫义〔 28 〕
刘表荆州政绩浅议	余鹏飞〔 38 〕
标榜风流 远明管、乐 ——略论诸葛亮的名士风范	牟发松〔 48 〕
司马徽新论	夏日新〔 64 〕
《孙子略解》与曹操的兵学成就	龚留柱〔 72 〕
“铜雀三台”与曹魏政治	方北辰〔 86 〕
略论曹魏国家的将军制度	张鹤泉〔 99 〕
三国人物对汉家历史的解读	章义和〔 112 〕
走马楼吴简中监池司马与屯田	蒋福亚〔 123 〕
曹、刘汉中争夺战述评	谭良啸〔 132 〕
畿纬与魏晋南北朝史观	吕宗力〔 143 〕
从吴简看孙吴时期的性比例失调和疾病人口问题	高 凯〔 154 〕
三国时期曹魏的税制改革和货币经济质变	〔 日 〕柿沼阳平〔 194 〕
曹魏俗乐的政治意识形态化 ——从鼓吹乐所见	〔 日 〕渡边信一郎著 牟发松译〔 210 〕

阿育王传说与江南皇帝

- 以三至六世纪为中心 [日]河上麻由子[216]
- 襄水释名 叶 植[234]
- 《三国演义》与经营之道 沈伯俊[248]
- 汉江灵珠 孔明故居 吕一飞[258]
- 西汉德属再探讨 李梦泽[260]
- 从入仕、拒仕新莽政权看豪族与汉皇权之关系 张 欣[269]

近年来三国历史研究状况

◇ 梁满仓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三国史研究是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一个热点。关于三国史研究的状况,成果极其丰富,因此只能讲讲近年来的状况。

近年的概念,具体地说,只能限制在近五六年,也就是2005年以来。即使这样,也还要做进一步限制,即仅限制在概括整体研究和国外(日本)研究方面,在具体介绍成果时,只以2010年以来的成果为限。之所以如此,因为第一,成果太多而时间有限。第二,201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所研究的领域和 Problem 是以以往的研究为基础的,能反映近年来的整体面貌。第三,这些代表了史学界三国研究的最新成果。

三国历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三国政治、行政制度、封爵制度、民族政策、三国人物、手工业生产、妇女、货币、军队建设、战争战役、军事制度、典籍校勘、三国史料、儒家思想、文学学派、城市变迁、城市考古、三国遗迹、三国文化旅游等等。上述问题中,有的受关注程度较高,有的受关注程度一般,也有的受关注程度较低,因此,不可能每个问题都谈到。这里只概括为五个方面,力求反映近年来三国研究的整体状况。

一、走马楼吴简研究

1996年1月至11月,长沙市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巷发掘了61口古井,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有17万枚竹简,数量之大,超过了20世纪全国出土简牍总量。从此,掀起了一场三国吴简研究的热潮。这场热潮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高层次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2000年春,北京大学成立“吴简研讨班”。2005年12月,湖南建立走马楼简牍博物馆。成立于1995年的中国

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也投入了对吴简的研究工作。在日本,1999年,日本学术界成立“长沙吴简研究会”。

第二,全国著名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纷纷投入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撰写研究论文的作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历史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吉林大学古籍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南京晓庄学院、湘潭大学商学院、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湖南商学院旅游管理学院等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

第三,持续不断的研究热潮。长沙走马楼吴简已经出土十五年了,十五年来,对吴简研究的热度始终不减。从2005年至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湖南大学学报》、《中国农史》、《江汉考古》、《史学月刊》、《中国历史文物》、《南都学坛》、《人文杂志》、《历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东南文化》、《船山学刊》、《社会科学战线》、《南京晓庄学院学报》、《文史博览》、《文史哲》、《考古》、《浙江社会科学》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研究文章70余篇。2005年12篇,2006年11篇,2007年9篇,2008年12篇,2009年16篇,2010年11篇,几乎每年都有十篇以上的研究文章。

第四,日本学者对三国吴简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2006年至2010年,共发表文章25篇,几乎每年都有文章发表。文章的内容也很广泛,有研究吴简内容的,如伊藤敏雄《嘉禾吏民田家莧における米納入状況と乡丘》(《历史研究》四三号,2006年3月)。谷口建速:《长沙走马楼吴简における谷仓关系簿初探》(《民众史研究》第七十二号,2006年11月)。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如关尾史郎等:《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に関する比较史料学的研究とそのデータベース》(2007年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B)研究成果报告书)。有对吴简文字进行考释的,如伊藤敏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释文补注(稿)》(《历史研究》四三号,2006年3月)。有吴简研究报告,如洼添庆文等:《长沙吴简研究报告》第3集(2007年3月)。特别是2010年2月,还出版了《长沙吴简研究报告2009年度特刊》,集中了伊藤敏雄、关尾史郎、谷口建速、鹭尾佑子、永田拓治、阿部幸信、佐川英治、安部聪

一郎、鹤田一雄等一批中青年日本学者的研究报告。

二、曹魏政权研究

曹魏政权一直是三国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2010年至今,仅一年半的时间,在《中国史研究》、《复旦学报》、《文史哲》、《襄樊学院学报》、《安徽史学》、《中州学刊》、《中原文物》、《学术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广西社会科学》、《黑龙江史志》、《鸡西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贵州文史丛刊》、《黑龙江史志》、《衡水学院学报》、《黑龙江民族丛刊》、《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河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曹魏政权研究的论文35篇。内容涉及礼仪制度、史官制度、财税制度、中央职官迁转制度、九品中正制度、丧葬制度、屯田制度、皇室世系、民族政策、都城建设、道德生活、文学、美学、艺术等。其中不乏有创见、有新意的力作。例如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的《曹魏代汉后的正统化运作——兼论汉魏禅代对蜀汉立国和三分归晋的影响》即如此。文中指出,曹魏代汉在政治形式完成以后,意识形态形式远远没有完成。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是通过曹丕、曹睿父子两代人的努力完成的。曹丕、曹睿父子,竭力摹仿尧舜禅让,通过礼遇汉献帝及其后妃,笼络汉之元老耆宿,更易正朔、服色,逐步确立“魏家舜后说”,并对郊祀礼制加以改革,从而对曹魏的正统化地位进行了确认和完善。这篇文章实际探讨了古代礼仪制度在重大历史变革中的作用。

日本学者对曹魏政权的研究也成果颇丰。渡边义浩《九品中正制度と性三品说》、川合安《九品官人法の制定と贵族制形成》是研究政治制度的,森本淳《曹魏における刺史と将军》、石井仁《三国魏の征蜀将军について》、《蜀の都督制度とその周辺》、《三国時代の都督制》是研究军事制度的,落合悠纪《正始石經の建立と曹魏後半期の文教政策》、《曹魏時代における太学について—明帝期を中心として》是研究教育制度的。此外,还有研究人物的、研究汉魏禅代的、考证释义的,不一一列举。

三、蜀汉政权研究

2010年至今关于蜀汉政权研究的文章数量次于曹魏政权研究,共有18

篇。蜀汉政权的盛衰兴亡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问题。《用人之道决定兴亡之道——蜀汉与曹魏的两样灭亡》(《国学》2011年第2期)、《从人心向背来看蜀汉的灭亡》(《青年作家》2010年第12期)就属此类问题。《三国蜀汉政权派系动态分析》(《巢湖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东州士”与蜀汉政权》(《成都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则从蜀汉政权中政治力量变化的角度论述政权盛衰兴亡的关系。《“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政治遗产清理》(《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则认为刘备在认识和实践上对《隆中对》的理性考虑不足,是蜀汉政权衰势命运走向的直接主观原因。

《蜀汉政权的军政体制与战时经济》(《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11年第3期)是关于蜀汉政治研究的文章。文章认为,蜀汉政权的政治体制在诸葛亮去世前表现为军政合一的特点,诸葛亮去世后,军政合一体制分化,呈军政分离倾向。《出师表与蜀汉政治》(《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认为,《前出师表》详细规定了刘后主与辅佐大臣各自的职责所在和应遵守的政治伦理秩序,设计了蜀汉统治政权的权力架构及运行方式。《后出师表》对一年来军国大事的实际状况作了全面的说明和解释,提出了辅佐大臣应坚持的道德操守,确立了蜀汉统治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两份《出师表》是蜀汉建国后建设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蜀汉官制研究,有《蜀汉东宫官制述论》(《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1期)、《蜀汉蜀郡郡守考略》(《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1期)。

蜀汉钱币研究,有《三国时期蜀汉钱币收藏研究》(《安徽钱币》2011年第1期)、《蒲江县出土的窖藏“蜀汉五铢”钱》(《中国钱币》2010年第1期)。

蜀汉与荆州的关系也是蜀汉研究的重要问题。《蜀汉失荆州的主观原因探析》(《魅力中国》2010年第11期)、《夷陵之战的规模及蜀汉失利的根本原因》(《军事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论荆益二州的轻重关系及荆州之失的责任追究》(《襄樊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蜀汉佛教问题鲜有学者注意,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学者所撰《蜀汉佛教流传考》(《五台山研究》2010年第4期),根据近年蜀地出土的一些带佛教元素的文物,结合相关文献对佛教在蜀汉的流传形态以及周边问题做出推测,属填补空白之作。

日本学者也对蜀汉研究给予一定的关注。在这方面有满田刚撰《蒋琬

政权の北伐计划について》(创価大学人文论集第18号,2006年3月)。

四、孙吴政权研究

从2010年至今研究孙吴政权的文章与研究蜀汉的文章数量不相上下。《走马楼吴简与孙吴时期的工商业》(《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从走马楼吴简户籍书式看孙吴对秦汉户籍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反映了学界对新材料的利用。

孙吴政治研究相对较热,有《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治关系》(《南都学坛》2011年第2期)、《试论世家大族对孙吴政权的不利影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1期)、《略论孙吴的社会矛盾及其表现》(《许昌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论孙吴对岭南的统治》(《鲁东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三国孙吴张温案考论》(《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祥瑞与孙吴政权的运行》(《科教新报》2010年第24期)等文章。

文物考古研究方面,有《湖北省鄂州五里墩出土孙吴时期“红色粉状物”的测试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0年第1期)、《湖州长超山发现孙吴时期纪年墓》(《东方博物》2010年第4期)、《孙吴时期青瓷俑的分类与社会生活》(《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等文章。特别是《南方文物》上刊登的这篇文章,利用2005年南京江宁上坊镇一座孙吴时期的特大型墓葬出土的文物,揭示了孙吴社会生活状况。

关于佛教研究,有《孙吴佛教流传考》(《东南文化》2010年第3期),该文与《蜀汉佛教流传考》均由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学者撰写,为全面研究三国时期的佛教做了有益的工作。

五、三国人物研究

三国人物研究近一二年的热度应当首推曹操。从2010年至现在,各类刊物已经发表了研究文章近400篇。这些刊物有《历史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安徽史学》、《文学界》、《西南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宁夏师范学院学报》、《许昌学院学报》、《鸡西大学学报》、《巢湖学院学报》、《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西昌学院学报》、《南阳师范学院学报》、《宝鸡文理学院

学报》、《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等,作者包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南京大学文学院、华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山东大学宗教所、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安徽大学历史系、陕西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重庆文理学院、苏州大学文学院、许昌学院文学院、陕西师大音乐学院、黑龙江伊春职业学院等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教研人员。

曹操研究之热,首先得益于2009年底河南安阳曹操墓的发掘。曹操墓的发掘引发了一系列大讨论,甚至大争论,有些文章的言论早已超出了学术讨论范围,不能称之为学术研究。但学术研究仍是曹操研究的主流。2010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的《曹操高陵》,收集了秦汉魏晋研究专家20篇论文,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收集的秦汉魏晋研究专家52篇论文都是严肃的科学研究论文。区分文章是否为科学严肃的,当然不是依据所持的观点,而是方法和态度。比如方北辰先生的文章《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成都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尽管对曹操高陵提出异议,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是严肃科学的学术论文。

曹操研究之热,还在于曹操本身在历史上的地位。近一年多来关于曹操研究的文章,也有不少与曹操墓无关的。《曹操评价述评》(《文学界》2011年第5期)、《曹操形象的变化》(《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曹操浅论》(《巢湖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等文章对曹操进行总体评价。《从曹魏都城建设与北方运河开凿看曹操的历史功绩》(《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从重大工程切入论曹操的历史贡献。《从曹操入仕看汉末孝廉察举之变化》(《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透过曹操的仕途分析汉魏之际选官制度的变化。《论曹操教令的思想内容及表现手法》(《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论曹操的廉政思想》(《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论曹操诗歌及其儒家思想》(《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论曹操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论曹操的神仙思想及其游仙诗》(《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从各个角度对曹操的思想进行研究。《对孔融其人及其与曹操关系的再认识》(《西昌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探讨曹操与孔融的关系。《曹操与原始道教》(《历史研究》2011年第一期)探讨了汉魏之际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曹操与原始道教牵涉至深的关系。《从曹操到曹丕的诗歌变化看建安文学的发展轨迹》(《现

代阅读》2011年第4期)、《略论曹植诗歌的结构——兼与曹操比较》(《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曹操与傅玄乐府诗之比较》(《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曹操对儒家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等文章则对曹操的文学成就进行论说。

曹操之外,另一个人物研究的热度也持续不退,这就是诸葛亮。从2010年至现在,共发表关于诸葛亮研究的文章将近200篇。如果说“曹操热”有部分原因是曹操高陵的发掘,诸葛亮研究则没有曹操高陵那样的特殊事件的推动,从这一意义上讲,人们对诸葛亮研究的热度,丝毫不亚于曹操。

诸葛亮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南征北伐的评价、躬耕地的问题、军事失误的问题、《出师表》、《诫子书》等文章的解读、诸葛亮的读书方法、诸葛亮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诸葛亮的《隆中对》、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诸葛亮与夷陵之战、诸葛亮治蜀、诸葛亮与儒家思想等等。

上述问题可以说是史学界研究的老问题,在此以前许多文章都对此进行探讨。不是说对这些问题进一步探讨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史学界应该更多地发出诸葛亮研究科学的声音。因为第一,在一些问题上,学术界确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现象。不同看法只有在反复深入的研究探讨中才能接近正确的认识。第二,在诸葛亮研究当中,也有一些非科学的态度,以标新立异吸引眼球为目的。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去和他们争论,但我们应该拿出有说服力的科学成果,让广大群众去辨别,去选择。只要我们拿出的成果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就会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正是我们研究诸葛亮的意义所在。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早在1998年团结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朱大渭先生合写的《武侯春秋》,得到学界和社会的好评,日本的中村圭尔教授还为此书写了书评。事隔9年,中华书局再次将此书出版,改名为《诸葛亮大传》,不久台湾麦田出版社又买去版权,更名《一代军师诸葛亮》在台湾及东南亚发行。日本学者津田资久又在2009年《东方》杂志上写了书评《称阳型诸葛亮评伝の集大成とその限界性「诸葛亮大伝」》。可见此书在国内及海外的影响。

2010年至今关于刘备的文章近80篇,其生平事迹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到荆州以后。《刘备“三顾茅庐”辨》(《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论述了刘备到荆州后三顾茅庐的必然性。《刘备“取成都”初论——刘备入蜀1800周年纪念》(《成都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论述了刘备从取成都、称

帝成都再到入葬成都的全过程。《刘备在白帝城论析》(《成都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探讨了刘备人生的最后时段和托孤的心态、环境,并对伐吴及其失败的原因、刘备的托孤是英明人主的明智抉择进行了论证阐述。《刘备的祖辈、妻妾后妃和子孙述考》(《襄樊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对刘备的祖辈、妻妾后妃和子孙一一阐述、考定。刘备研究更加广泛深入。

其他三国人物如关羽、孙权、鲁肃、周瑜等也有一些,但不如上述人物集中,不一一列举。

对诸葛亮“南征北伐”的评价

——◇ 朱绍侯 ◇——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跨有荆益”，两路出兵北伐曹魏的设想时，是非常乐观的。他对刘备说：“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①按照诸葛亮当时的判断，只要实现两路出军北伐，就会受到北方百姓“箪食壶浆”般的热烈欢迎，这样，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国家就能实现统一。

诸葛亮所以如此乐观地设想北伐的成功，是有历史根据的。因为汉高祖刘邦就是以益州和汉中为根据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进入关中消灭三秦王，最后打败项羽而统一全国的。何况现在刘备又多了一个荆州，故诸葛亮对北伐胜利是比较有把握的。

但后来由于关羽的“大意失荆州”，使诸葛亮两路出兵北伐的战略部署落空。然而仅是失去荆州，对蜀汉的影响不算很大，更严重的是，在关羽失荆州之后，刘备一心要为关羽报仇，于章武二年（221年）七月，在他即皇帝位仅三个月之时，不听群臣的劝阻，不顾蜀国初建、百废待兴、强敌在北、虎视眈眈的客观形势，执意率四万大军东伐孙吴。结果刘备在猇亭（湖北宜都长江东岸）中了陆逊火攻之计，被破四十余营，汉军土崩瓦解，前后损失数万人。刘备夜遁，逃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路军资，一时略尽”^②。猇亭之败，比关羽失荆州损失更为严重，蜀汉受到更为沉重的打击，“国之精锐，尽于夷陵”^③。从此蜀汉无力与东吴抗衡，并处于两面受敌的艰险困境。所幸

①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59年。

② 《三国志》卷58《陆逊传》。

③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5，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中华民国二十七年。